

传统文化现代融合的逻辑与路径

晏青 陈光凤

摘要：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存被表述为一场文化危机叙事。这场合法性危机源自传统文化“光韵”的削弱或消失，以及由此造成作用机制的大面积失效。但同时，传统文化以另一种方式为市场化经济、权威政治提供合法性力量，还为现代社会困境提供解决的可能性思路。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往实践，具有理据性与实践性，更是走出文化“法西斯”的重要举措。遵循多线性、辩证性和技术性原则，现代文化方可走向健康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大众文化；文化融合；文化交往

作者简介：晏青，男，讲师，文学博士。（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510632）

陈光凤，女，博士生。（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阿尔伯塔 埃德蒙顿，T6G 2R3）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6）03-0130-04

一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概念和意指在启蒙、救亡、资本的多重变奏中飘浮不定，尤其随着市场化、全球化、资本化的深入推进，传统文化的生存语境越来越复杂。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欣赏和传承被商品交换、消费所取代，其价值首先根据的是它的交换价值，而非它的内在美学性质。笔者不想以一种理论模型来解释传统文化传播中的所有问题，这只能是一个乌托邦设想，因为多面向、多层次的人类实践，不可能存在一个单一原则的规范理论，况且遵循这种生成的元语法规则的实践本身就是被结构化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下，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研究和实践主要有三种模式：“冲击—反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模式为我们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维度，对其发展的主要矛盾、障碍有较为清晰的概括。本文的研究重点不是可操作性、具体的传播路径与策略，而在于阐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娱乐时代的“弃妇”，不但不是“弃妇”，还是重要的民族传统，需积极与大众文化汇流，实现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文化交往，以及文化创新。

一、传统文化生存危机的深层剖析

传统文化再生产的主要因素包括原创能力、公共投入、市场主体、融资能力、科技水平等等。可是在现代性建构中，传统文化的现代境遇被表述为一场文化危机叙事。从社会机制的运行来看，农业文明下的传统社会机制服从自然原则，起支配作用的是宗法血缘关系，社会靠人情关系和血缘关系维系。现代文化是市场调动、资本引导、效率优先的大众文化符号系统。在这场文化变迁里，传统文化原有的“坚固”的价值被祛魅，价值统一性崩溃，陷入从未有之困境。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语境身陷囹圄：一方面，在传统社会，它本身就是神话，但在中国20世纪数次思想启蒙和社会政治运动中被消解；另一方面，作为思想启蒙资源有益的部分，传统文化又因为启蒙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和权力时，被后现代主义推倒。所以，传统文化以思想的异端、现代性的对立面出现时，是一种需要被启蒙运动予以澄清的客体；以内在自发性作为启蒙的思想资源，它的思想、价值生存在现代大众媒介环境里被边缘化。现代娱乐不经意又将它推向另一个极端，使之成

为现代娱乐狂欢的“佐料”，并因此广为关注，被重新赋予权力，组建新的利益阶层，以及权力演练场。娱乐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刚性需求，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介生存也无法逃脱娱乐的漩涡。

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最直接体现为“光韵”的式微。传统文化的神秘感、崇拜感、超越性等特征塑成了它的“光韵”，可是这种光韵在现代社会生活、文化作品中消失了。纵观人类历史的种种革命，有两个彻底改变了生活的实质：一个是商品生产的工业革命，另一个是文化生产的工业革命。第一个革命改变了物理环境的资源条件，第二个革命将变革延伸到了符号环境。^[1]传统文化的式微便是符号变革的结果。在本雅明看来，“光韵”主要有这样两种：一是自然的，另一是历史的。其中历史的光韵消失是由于“复制技术使得复制物脱离了传统的领域”，并随之造成大量的复制品象征性地取代独一无二的实体；复制技术“使得复制物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成为视听对象，因而赋予了复制品一种现时性。”^[2]丧失光韵的传统文化，失去神性的一面，向工业逻辑靠拢。

从社会效能层面来看，光韵的式微甚至消失使得传统文化失去主流位置。在分析作用机制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构成部分与结构。具体而言，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有这样两种可能性：第一个是本体层面的，可称之为“物的秩序”，相当于康德所说的“自在物”概念。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与现代没有关联性。第二个是认识论层面的，可称为“人际关系”，主体间必须经由对话才可能把握知识。也就是说，第一维度上的任何关于“物的秩序”的知识都只能从主体间的社会交往中呈现给主体，主体经由社会交往而认知世界与自身，故命名为“人际关系”。第三个是价值层面上的，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下获得的价值，反过来支持特定的人际关系。

从深层次的角度来分析传统文化生存困境的原因，首先，事实与价值分离，蕴含于事实之中，并为事实支持的神圣价值或意义指涉被剥离。事实世界不再承诺关于世界和人生意义的知识。传统文化变得只是事实本身，其中不带最初的意义和价值。由此，“价值”缺乏现实依附性、客观的确定性和规律的普遍性，价值归属于个人的偏好。其次，由于价值的私人化，价值不存在优劣之分，无等级差序，“差异并存、不可通约”，而造成价值共识的困难。没有什么价值是最好的，没有哪一条真理是唯一正确的，也不存在通往终极真理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它们彼此竞争，无法统一，难成共识。^[3]近代以来，启蒙理性完成了对传统神话的祛魅，以宗法为统治力量的社会分崩离析，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被分化、分解为世俗操作的工具理性，文化的光韵消失，文化的功能从膜拜价值变成了展演价值。

神圣价值的消失，价值共识的困难，传统文化被计算和功利、被周密计划和商品化所替代。“文化传统的支配因素正在丧失世界观的性质，即对世界、自然和历史的总体解释特征，追求复制出一种总体性的认知要求，屈服于各种对科学信息的一般综合，屈服于一种从外部领域退缩出来或失去理想特征并深入生活的艺术。”^[4]这些现代性恶果将人们引向反观传统文化的追问。

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合法性

尽管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遭到“数字化生存”下人们的质疑，深陷合法性危机。但是我们要看到，传统文化仍以一种自在的形式作用于现代生活，甚至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实现其合法性。

我们沉浸于大众文化的狂欢与癫狂，传统文化似乎与我们“无关”。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其实传统仍旧活跃于当世，更多呈现为功能性的和表现性的。传统文化的功能性在于多元包容，并在这种多元中有着生成新元素的潜质。所以说，传统文化对现代知识再生产、文化共同体维持等方面的作用仍值得期待。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现状：它没有依循市场的自发原则进入社会主流生产序列，但仍作为集体无意识，或者国家调控形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出现。所以它才可能具有继续提供合

法性和意义生产的能力。因为“文化传统具有自己脆弱的再生产条件。只要它们是以自发的方式形成,或者带有解释学意识”,“它们就依然具有‘活力’”。^[4](93-94)]虽然传统文化无法像大众文化那样,成为政治、商业的宠儿,在社会结构和主流框架中举足轻重,但仍然在国家认同和政治共同体方面发挥影响力。

传统文化除了为市场化经济、权威化政治提供合法性力量,还在于可能为现代社会困境提供解决的思路。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或者以新教伦理为基本形态的市民阶级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本身必须依托于资本主义之前的传统。在面对人生的一些突发事件,比如疾病与死亡,中国古人的处理思维可能更有效。例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中国传统思维里,人依据自然法则生存着,技术、理性或制度并不能超越自然。但是,在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科学中,“让人有一种可以克服无常与偶然性,把偶然性放到必然性环境中处理的方式”,可是古代人民“把生老病死作为基本的生存前提接受下来,而现代社会在克服古代社会所必然面对的宿命,但实际上现代社会把广义上的自然内部的偶然性和混乱吸收到、转移到自身的社会文化系统内部”,“人以技术系统把自然内部包含的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纳入内部”。古人社会“不是围绕一种高度自律的个人内核运转的——理性化的个人、追求技术的个人、内在性的个人、批判性的个人、分析性的个人——所以人和人、内和外的关系相对而言有一种和谐,至少在文化、道德、观念的层面上是如此”。^[5]从这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能够解决工业逻辑、符号表征系统中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流水线中的被奴役的身体、信息时代被符号限定的主体,都可能是现代社会遭受的囹圄,求助于现代社会吊诡的逻辑却无济于事。但反观先人留下的智慧,传统文化或许是现代性困境中的一个需要深掘的宝库。

三、从冲突到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往实践

回顾历史上的种种文化交往融合互动,发现文化融合是社会变革、文化冲击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现象。笔者之所以提出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交往融合,是正视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新道统的选择。

在现代社会的诸多场域中,传统文化是委以重任的。传统文化的转换不是某个层面或维度上的,而是一场总体性转变的复杂现象。就如舍勒所说的,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和精神气质(体验结构)的结构转变。^[6]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不管是文化批判,还是本体性建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以“共性”、“共存”缓和冲突,形成求同存异的交往格局。

文化无优劣之分,单纯地把某一种文化形态奉为圭臬是不可取的。古代社会传统文化占绝对优势,而如今大众文化风靡社会,但如果单纯以大众性来要求传统文化,这就人为地将大众文化“专制化”了。在无以计数的研究文献中,大众文化被捧上神坛,其中娱乐似乎成为一场民主、自由的庆典。所以说,对某种文化形态持有优越感的一元文化观是不可取的。“每一种文化,尤其是成熟的文化,对于创造它的那个民族来说,它总是自足的或是相对自足的,就是说,其内具备了它所需要的基本要素。”^[7]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8]两种文化的主流精神是不可通约的,但这并不妨碍两者互动。相反,这种差异、多元与失序性都是文化生产的活力所在。正如耗散结构理论所揭示的,“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耗散结构理论研究系统怎样从混沌无序的初态向稳定有序的结构演化的过程和规律,并且力图描述系统在变化临界点附近相变的条件和行为。“平衡是有序的源泉”是该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此视域中,“平衡结构是孤立的静止的死结构”,而“非平衡结构则是开放的流动的活结构”。^[9]也就是说在这种开放、变化的流动的不平衡结构中,可能生产出当代文化的良好秩序。在现代多种文化观念的不平衡格局中,如果严守一种文化的疆界,为了结构的平衡而将文化僵化是不可取的。在不平衡的视域中,尤

其大众文化格局中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等多元化，内部除了差异，还有变化、流动，这也正是文化有序共处的可能性所在。

那么，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个系统，看上去是现代文化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实体，是否能够在不平衡中实现有序的文化生产秩序呢？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以和为贵的伦理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重义轻利的人生价值观；天人合一的理性自觉”^[10]。传统文化有神圣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传统文化的神圣性源自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承载物，具有超越世俗社会的天然属性。作为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承载着为社会提供“持续的认同感”的历史责任。传统文化是古代人民的生活实践结晶，是一种源于日常生活的文化实体，流露了古代人民的喜怒哀乐，是日常生活中人的遗产。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表述、社会实践、表现形式、技能、知识、工艺品、民俗等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些都是它世俗性的表现。

而大众文化，明显已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新道统”。大众文化的低门槛、感官性、狂欢性、娱乐性等逐渐凝结为一种思维方式，甚至积淀为一种新传统，渗透到日常生活和文化领域，构成现代世俗文化的表征。正如本雅明所说的，可复制性让艺术作品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自身从依附于礼仪的生存中解放出来，它也就丧失了神圣性和神秘性，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它的美学品质也不再追求特有的个人化的品味，转而寄情于对事实及日常生活的白描。哈贝马斯也认为：“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这一惯常看法揭示出，排挤机制在进行分野和压制的同时，也唤起了无法抵消的对抗力量。”^[11]

甚至我们看到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权力分配和再分配活动中，发挥了区隔化、优异化、区分化、引诱、宰制和控制等功能。在20世纪的数次社会变革中，传统文化甚至被认为与现代文化之间不可并列于世，水火不容。但是，现实困境远不是非此即彼所能解决的，我们应该以理性思维来看待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往问题，这种交往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依据。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大众文化无法真正取代传统文化。^[12]

这些概念的理解、尝试和实践，都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汇流的潜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要实现这种汇流需要守住几条原则：一是多线发展原则。当代文化受到多种因素规约，因消费主义影响，便有“经济—文化”维度；因政治需要，便有“文化—政治”维度。要合理发展伦理、经济、政治等多维文化，进而进行多线发展。要警惕被消费主义带入歧途，也要警惕隐藏在大众消费文化一体化背后资本主义的“文化战略”的文化入侵。二是辩证性原则。这种汇流，并不意味着两种文化形态完全要在一条“河道”里流淌，也不是全部的传统文化都能够转化的，而应该是“形式的转换、内容的转换和作用的转换”^[13]。重提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求崇尚古旧，传统文化非理性、非人性的一面并不值得提倡。而像理想主义传统、集体主义精神等优秀成分，是需要重点提出来的。所以说，汇流是有选择性的，是建立在辩证性、契合性和时代性之上的汇流。三是合理化设计原则。现代传媒技术让人瞠目结舌，移动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因为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意味着现代话语可以对其随意进行价值扭曲、意义瓦解式的呈现。要实现这种汇流，有必要重视现代应用，以及相关软件的设计。因此，传统文化的辨析性与大众文化的合理化设计是实现两种汇流的重要因素。

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是文化发展的常态。非此即彼的视点便忽视了某些富有生产力的维度，文化的共存能够为不同文化提供新的视角。不管成功与否，应该说，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进行融合的一些启示。从某个层面来讲，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都是以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为根本目的的。所以说，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存要走出伦理道德、合法性的双重围困，就应该有效借用现代传媒技术，与大众文化彼此对话和沟通达成共识，在互动、流动、差序关系中实现秩序，实现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下转第140页）

(上接第 133 页)

参考文献:

- [1] Gerbner G. The Hidden Message in Anti-Vilence Publice-Service Announcements [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5, 65 (2): 292-298.
- [2] [德]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M]. 王才勇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15.
- [3] 王蓓. 合法性: 现代语境中的价值叙事 [J]. 哲学研究, 2007 (11): 69-74.
- [4] [德]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04.
- [5] 张旭东. 经济理性时代的价值空洞——重访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 (下)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 (2): 106-115.
- [6] [德] M·舍勒. 资本主义的未来 [M]. 罗梯伦等译. 香港: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182.
- [7] 姜克俭.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N]. 大众日报, 1996-04-17 (4).
- [8]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4.
- [9] 谭长贵. 对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几点思考 [J]. 系统辩证学学报, 2005 (2): 29-32.
- [10] 蔡世华. 中华文化复兴的理性之源与价值重建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2002 (10): 102-107.
- [11] [德]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曹卫东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7.
- [12] 晏青. 泛娱乐时代的传统文化传播: 困境、方法与走向 [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144-147.
- [13] 杨翰卿, 李保林.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1): 80-89.

[责任编辑: 赵晓兰]